

■ 时论与争鸣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5.06.009

从金榜题名到濒临退学： 底层文化资本的结构性困境



李济沅

(浙江大学 德育与学生发展研究中心, 杭州 310058)

摘 要:通过对高水平大学退学学生、退学警告学生等具有濒临退学经历学生的深度访谈,以及在知乎平台退学相关话题下的网络田野调查发现,曾经助推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实现教育突围的底层文化资本,在部分高水平大学本科生群体中正面临解释失灵的困境。底层子弟面临的退学危机并非单一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内在动力桎梏、代际互动冲突以及教育支持错位等结构性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这虽然反映底层文化资本在嵌入精英大学文化场域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但并不意味着底层文化资本的“失败”,这种现象更像是当底层子弟所处的现实境遇超出其底层文化资本限度时呈现的必然结果。就底层子弟而言,适度运用自身的底层文化资本,主动补充其他优势群体拥有的文化资本,有助于他们应对未知的挑战。

关键词:底层文化资本;名校生;濒临退学;结构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5)06011711

长期以来,社会上有关“寒门出贵子”的讨论总是备受关注。“寒门贵子”之“贵”往往体现为底层子弟在高考中“金榜题名”考入名校,而他们在大学遭遇的不可避免的竞争和学业适应困境却被大众忽视。事实上,进入名校后,学生所面临的竞争态势要比以往更加激烈。在名校生竞相追逐的背景下,相对弱势群体趋于边缘化的“非主流”叙事容易遭到遮蔽。相较而言,家庭支持及社会资源匮乏的底层子弟在高水平大学的高竞争环境中,更加容易出现适应困难,其中部分学生甚至面临学业危机乃至濒临退学的困境。

修回日期:20250711

基金项目:浙江大学第十二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研究课题“高水平大学学困生形成机制及应对策略”(2025ZDSZZD01)

作者简介:李济沅,男,黑龙江佳木斯人,浙江大学德育与学生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引用格式:李济沅.从金榜题名到濒临退学:底层文化资本的结构性困境[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6):117127.

Citation format: Li Jiyuan. From being named on the golden list to the brink of dropout: structural dilemma of cultural capital of underclas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5, 13(6): 117127.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一) 理论基础

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了通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实现阶层复制的机制。文化资本是制约底层子弟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学界基于此形成相关研究的主流叙事。同时,学界也关注到仍然有少部分底层子弟跨越了布迪厄的“预言”而取得高学业成就,并且同样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出发进行了有益探索。

1. 寒门出贵子:助推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文化资本

当前,从文化资本视角解释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研究主要呈现两种面向。(1)文化资本“补偿说”,即底层子弟通过多元渠道,如自身苦读努力、家庭全力支持、对学校和教师的依赖等,补偿其原本处于相对劣势的文化资本,主要方式为“用”。对像农村学生这样处境不利的群体来说,他们可以用文化资本即优异的成绩来兑换优质教育资源(如重点中学的入学机会),跳出阶层再生产的框架^[1]。学生责任感/自律和自尊等自身的文化资本以及来自政府、学校的资助等弥补性资源均对底层子弟的教育获得具有促进作用^[2]。(2)文化资本“原生说”,即底层子弟基于自身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实践原生的一种文化资本,构成该群体独有的竞争资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底层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认为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是充分利用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的结果,这种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包括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3]。朱镕君进一步从空间视角阐释了底层文化资本生成的空间机制,指出底层文化资本内生于家庭、外嵌于乡村、弥补于城镇,在空间流动中不断积累形成^[4]。

2. 寒门贵子难:底层文化资本的限度与暗面

作为在中国语境下创生的概念,底层文化资本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但并非无懈可击,学界对底层文化资本的限度和暗面进行了反思。事实上,底层文化资本的论述只解释了少数农家子弟超越经济、文化逆境实现学业成功和阶层跨越的现象,却难以解释农村学生普遍的教育失利现象^[5]。同时,虽然勤奋、坚持、自律等文化品性会加持教育优势的获得,但这些品性并不具有阶层特征,只是更吻合底层群体的生存境遇和品性要求,因此造就了部分底层群体子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胜出,并助其获得精英大学的入场券^[6]。同时,程猛等也意识到,由“先赋性动力”和“道德化思维”等带来的过度使命感和道德感,可能会造成底层子弟面临过重的心理压力,从而制约他们的自由发展,构成底层文化资本的暗面^[3]。

综观现有文献,相关研究议题对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研究往往止于考入名校这一节点,而对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境遇关照不足。近年来,虽然农村籍学生在高水平大学的社会能力^[7]、阶层身份认同^[8]、群体性压力^[9]等问题逐渐得到关注,但为什么有些突出重围考入名校的学生会在大学面临学业困境甚至沦落到退学境地?是否存在一种结构性力量推动高水平大学底层子弟走向边缘化?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 研究设计

高水平大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是出现学业困难乃至退学危机的高发群体,且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女性^[10]。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遵循目的性抽样原则,选取 11 位来自中低收入家庭或中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并且考入名校(均为原“985/211 工程”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访谈对象(见表 1)。11 位受访者(按照 A1-A11 编码)均来自理工科专业,其中,男性 10 人,女性 1 人,他们在大学期间均有因学业困境而濒临退学甚至退学的经历。访谈形式为一对一的半结构化访谈,访谈主要聚焦从高中阶段过渡到大学阶段受访者在个人内在动力、与家庭的互动关系、学校生活融入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濒临退

学的经历及体验。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知乎作为网络田野,在“从清华北大或者其他顶级大学退学是怎样的体验”“从 985 大学(本科)退学是怎样一种体验”等热门话题下公开发布的资料中选取 21 位名校退学学生(按照 B1-B21 进行编码),收集他们的退学经历及体验。由于无法完全确认网络匿名分享者个人叙述内容的真实性,本文仅将之作为深度访谈材料的对照和补充。本文将访谈内容及网络匿名自述文章进行整理和内容分析,从内在动力、代际互动、教育支持等方面勾勒出高水平大学底层子弟濒临退学经历的整体图景。

表 1 访谈者信息

编号	性别	入学时间	生源地	学业轨迹
A1	男	2016 年	新疆塔城	2018 年退学后,2019 年再次高考,于 2024 年毕业
A2	男	2017 年	陕西西安	2020 年退学后,2023 年再次高考,未毕业
A3	男	2017 年	安徽阜阳	2020 年退学后,2021 年再次高考,未毕业
A4	男	2017 年	宁夏中卫	2018 年退学后,2019 年再次高考,于 2025 年毕业
A5	男	2019 年	四川古蔺	2022 年退学后,2023 年再次高考,未毕业
A6	男	2020 年	浙江温州	2024 年退学,2025 年再次高考
A7	男	2017 年	湖南衡阳	曾收到退学警告,延毕 2 年后于 2023 年毕业
A8	男	2017 年	浙江台州	曾收到退学警告,延毕 2 年后于 2023 年毕业
A9	男	2017 年	重庆	曾收到退学警告,延毕 2 年结业 1 年后于 2024 年毕业
A10	男	2017 年	云南德宏	曾收到退学警告,延毕 2 年后于 2023 年毕业
A11	女	2018 年	浙江绍兴	曾收到退学警告,延毕 2 年后于 2024 年办理结业

二、研究结果

(一)内在动力的异化桎梏

对“读书有用”的笃信,以及对“读书改变命运”的期待,构成底层子弟逆风向上的原动力,换来他们在学业上的孤注一掷。正是对学业成绩近乎偏执的追求,成为助力他们在高考中突出重围的密钥。然而,这种建构在学业成绩之上的先赋性动力容易陷入片面优绩主义的陷阱。

1. 学段转换间的意义真空

对先天条件并不占优势的底层子弟来说,在学业上毫无保留地付出格外重要,这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想信念作为支撑。进入大学之前,高考成为学生个人乃至整个家庭最核心的议题,几乎占据他们生活的全部。底层子弟的意义世界便是建构于高考这个具有短期性且较为狭小的空间情境,向上流动构成他们最为单纯朴素的信仰和奋斗主线。高考落幕,他们从原本熟悉的竞争和生活场域瞬时抽离,面临一定程度的意义真空,随之被带入一种虚无和迷失状态。“在大学期间,我没有获取足够多的信息,导致我对未来根本没有想法。从小到大都走在一条轨道上,高中时候就只想把自己做好,就会有结果。”(A10)将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比喻为“凤毛麟角”并不为过,“坚持‘十年寒窗苦读’后的收获感、跨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后的优越感以及沉浸于‘别人家的孩子’艳羡的满足感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他们在金榜题名后的瞬时成就感”^[11]。但喧嚣与荣耀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大学与底层子弟无论是现实空间距离还是文化心理距离都相对遥远。当优异的高考成绩兑换成一张通往名校的“入场券”后,面对看似光明却充满未知的崭新旅程,对大学为何读、如何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索,成为他们无法回避或搁置的人生命题。

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子弟来说,居于社会中心位置的名校既可能是未曾认真思考过的诗和远

方。如有自称“小镇做题家”的学生坦言“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了”^[12],也可能是仅仅停留在他者转述和人云亦云层面,对大学只有一些空洞又朦胧并且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想象。“大学和我想象的差距太大了,我想象的大学更加自主,我可以选择自己想学的东西、想做的事情,没有形式上的各种制约。”(A5)进入大学后,当憧憬的未来成为现实,底层子弟会显得局促、忐忑或不知所措。一旦关于大学诸多想象的“泡沫”被现实戳破,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意义世界就会面临巨大冲击。“上了大学以后,心里一下子没有了奋斗的目标,看到高等数学这种高难度的课不想刷题,其他课觉得无聊也不想下功夫,反而选择打游戏逃避。”(B20)面对从高中到大学的情境之变,底层子弟的意义叙事如果未能及时续写或者重写,为个人奋斗找到新的意义寄托,就会出现学习动力的丧失。

2. 显绩与潜绩间的冲突

“‘大学’正如同布迪厄笔下的‘游戏场’(field)——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有严格界限、存在明晰而具体的‘游戏规则’的社会领域,对此游戏抱有不同感觉的‘参赛者’置身其中,并投下各类资本作为赌注以试图取胜。”^[13]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衔接虽然在时间上连续,但在结构和节奏上并非线性发展的,尤其是从高中到大学阶段,学生普遍要经历生活中学习场域的变迁,与之相适应的游戏规则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底层子弟要经历更为艰难的心理和文化适应与融入,不可避免地会处于各种充满矛盾的情境中,其中就有以学业成绩为代表的“显绩”与以综合素质为代表的“潜绩”之间的冲突。“在我过往的认知里,只要把成绩弄好就可以了,结果到了大学发现,比我聪明的、比我勤奋的、比我多才多艺的大有人在,很受刺激。”(A2)“或许是被‘大学轻松论’洗脑了,我丝毫没有学习的心思,想着网上的人都是期末突击一下就好了,我当然也可以。于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在一些校企社团过得风生水起,然而代价是我第一学期就挂了3门课。”(B13)

显绩与潜绩间冲突的表象是时间精力的分配,其背后折射的是学生评价机制的变化。相较于高中学段,大学在学生评价方面更为开放、多元,呈现去中心化的发展态势,即学业成绩不再作为衡量学生的单一标准,学生在学业之外的表现也会得到认可。如此一来,之前一些被视为“不务正业”的行为在大学获得了合理性,“摇身一变”成为“斜杠青年”“特长达人”,这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对底层子弟来说无疑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大学里我有了许多新爱好,又会在热情消散后放弃,再也无法平静安稳地投入学习。”(A11)大学打开了生活的多维面向,但在丰富生活背后同样还裹挟着诱惑和假象,使他们在融入初期稍不留神就会失去生活重心。像社团活动、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这些学业之外的广阔天地,往往不是底层子弟擅长的领域,他们也许在跃跃欲试中惴惴不安,抑或在踌躇不前中望而却步,而试图在多元赛道上并驾齐驱也会带来角色冲突、精力分散等多重考验。显绩与潜绩虽非互斥关系,但都不可避免地会占用学生有限的时间精力。对先赋性条件并不占优势的底层子弟来说,想要同时驾驭大学生生活的不同面向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个人精力配置不当,很难平衡兼顾,进而容易在左顾右盼中坠落,迷失自我。

3. 学业是最后一块“遮羞布”

学业原本是底层子弟最拿得出手的“底牌”,但部分学生对大学即将面临的学业压力存在低估并且准备不足,加之想要补偿高中阶段全身心投入学习留下的遗憾等心态作用,他们会出现一种反学业文化的心理倾向,即认为学业不应该是大学的主线,甚至认为高中阶段不遗余力就是为了大学时光可以肆意挥霍。“我一直是比较自恃天赋的类型,在大学的学习前期抱有一种忽略自身真实的知识储备的盲目自信,认为自己平时不听课、不写作业,期末随便看两天书也能顺利通过甚至拿高分。”(A9)

学业虽然不是大学生生活的全部,但也并不如想象般轻而易举。即便投入不少精力,面对理想与现实、高期待与低回报之间的落差,底层子弟仍然时常笼罩在成为“差生”的恐惧之中,加之对生活中出现的偏差或者“脱轨”现象的承受和调适能力有限,容易陷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思维惯性。“我

是那种刷题型选手,高中刷了几百套理综,但是大学没有那么多题给我刷。大一的基础课都有海量的习题,大二之后的专业课没了习题,我就不知所措了。”(B2)从“学霸”人设跌落,陷入“学渣”的自我怀疑,意味着底层子弟曾经引以为傲的学业优势不复存在,他们关于大学乃至未来人生的美好想象也变得虚无,脆弱的自尊心以及向上流动的信心也随之被击溃。

(二)代际互动的道德困境

接受教育本是一种完善自我的路径。然而,对底层子弟来说,接受教育被赋予扭转家族命运的寄托,以至于演变成家庭乃至家族范围内具有公共性的道德事务。这会在无形之中催生一股道德压力,使底层子弟在对待大学生活时呈现一种反求诸己的道德倾向。

1. 紧张的家庭关系

大学阶段是青年大学生人格和心智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们逐渐离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走向社会的关键转折点。对底层子弟来说,“离家”与“上大学”相伴而生,底层家庭文化与高水平大学的精英文化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微妙的张力。“他们的情感世界很容易处于震荡之中,既会在城市和精英大学面临新文化情境的挑战,又要不断面对旧有的感情定向的拉扯。”^[14]从家到大学仿佛是一条两点一线的单行路,在这场不进则退的文化穿梭之旅中,他们与家的距离渐行渐远。“高考结束后,我在志愿预填表里写下了心仪的学校,但我妈一定要我改成其他的学校。我质问,不是说我是大人了,以后我自己做决定吗?我妈说,其他都可以你自己决定,但是这个不行,必须这样来。”(A6)

离家上大学为底层子弟带来空间和心理上的重大变迁,特别是随着学业颓势的蔓延,他们与家庭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联系的频率也越来越低,除了索要生活费获得基本的经济支持外,他们从家庭得到的支持非常有限。“学业危机那段时间和家里也有矛盾,当时我自己在外面租房住,基本不和父母交流,都是一个人在慢慢消化。”(A4)虽然底层子弟长期在外求学,在家庭生活中“缺场”,但是他们在家庭的中心位置未曾改变,在家人的议论声中一直“在场”,他们在大学的表现自然是家庭关注的焦点。家庭的高期待和弱支持之间的鲜明反差,成为笼罩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压力。

当学生出现严重的学业危机时,学校通常的做法是通过如寄送成绩单、电话告知等方式尽到告知义务并积极寻求与家庭的合作,这意味着“家—校—生”三者原本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学生不再是家与校的中间人角色,家与校的联结将学生置于一个更加被动的地位。此时,父母的不解、急切、愤怒、无助等情绪交织在一起,又一次转化成压力席卷而来,对学生的心态产生巨大冲击。“我慢慢就自暴自弃了,天天在宿舍打游戏,心里恨父母,我大学三年再也没有给父母打过一次电话,过年也没有回过一次家,至今我和父母的关系都非常糟糕。”(B2)家长的知情与入场将学生个人的学业压力转化为整个家庭的压力。在紧张的家庭关系下,这股压力并未在家庭场域中得到消解,反而进一步传导至学生身上,不仅无益于改变现状,也阻断了来自家庭的慰藉与支持。

2. 善意与无奈的谎言

横亘在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与家人之间的不仅有骤然间被动拉大的代际势差,还有彼此之间有意意识的隐瞒。家庭对孩子毫无保留甚至是超越承受能力的付出,既是一种以爱之名的无条件赠予,又是一场以孩子拼命用功取得优异成绩作为回报的隐形交易。当然,这种交易并不纯粹是利益的等价互换,而是裹挟着爱与期待等多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因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父母平时不管我,以往都是期末把成绩单给他们,他们就会很满意。我心思细腻,知道他们(父母)想要什么。爸爸说希望我有一天出人头地,让他们有面子。家里无形的期待,会成为我的一种动力,但也像是枷锁一样。”(A5)这种强烈的情感羁绊成功地操控了父母和孩子,就像没能为孩子提供优越的条件是父母的原罪一样,在大学没能取得好成绩复刻往日的成功,也始终是孩子难以打开的心结和不想面对的现实,这在无形中筑高了父母与孩子相互沟通的壁垒。父母本应是孩子在遇到困境时的依靠,此时却

成为他们不愿触碰的禁区,在与学校老师沟通的过程中,部分学生明确表示不希望父母知情,并对学校联系父母的行为持有排斥心理和拒绝姿态。“退学复读这一年非常痛苦,我和我的父母连承受现实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对外还一直说我在原来的大学,到现在亲戚们也不知道我退学的事。”(A1)

在学生看来,向家里坦白不仅会给父母带来沉重的打击,也是给父母徒增烦恼,因为他们认为父母能做的非常有限,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给彼此带来更大的心理负担。事实上,底层子弟的这些顾虑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他们的父母长期生活在县城或乡村这种熟人社会,家里正在读名牌大学的孩子是他们在社交中可供炫耀的“谈资”。对他们来说,孩子的失败也意味着父母人生的失败,所以放不下自尊的不仅只有孩子,还有骄傲的父母。“过去父母对我的期待很高,一直以来我在满足他们期待方面做得还可以,但是当我发现不能满足他们的时候就会非常懊悔。他们都不会和我明说(对我的期待),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俩一直都很为我骄傲。”(A8)即便是遇到学业预警乃至濒临退学这样严重的情况,有些父母还是倾向选择逃避,试图以没上过大学、不了解大学规则为由,为自己进行辩护或索性直接将责任推至学校一方,父母的逃避会进一步增加孩子的羞耻感。

3. 自我的道德审判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学业生活常常被视为一种道德事务。“‘懂事’是社会底层家庭常见的教育期待,也是孩子们的一种自然应对。”^[15]受道德化思维的影响,在底层子弟心中,学习与个人命运、家庭命运之间画上了等号,因此,努力学习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他们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和需要兑现的承诺。“大学7年,我的骄傲自负、自我放纵,乃至悲观迷茫、自暴自弃,都曾对我的父母造成极大的伤害,我也常常觉得愧对他们,但有时缺乏交流,导致双方的想法常常不能被很好地传递,造成更深的误解。”(A9)在一定限度下,这种高度道德化的情感力量可以激发强大的驱动力,帮助底层子弟克服现实阻碍,屏蔽外部干扰,直至取得高学业成就。长久以来,在外部客观条件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个人努力奋斗始终是底层子弟突出重围取得成功的密钥。在大学遭遇失败后,他们并不会一味地怨天尤人,往往倾向从自身找原因,更多地将学业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并未苛责学校或家庭,表现出一种反求诸己的道德取向。“最可怕的是,自己已经习惯了懒散的生活,像高三时那样快节奏的生活,真的很难适应,最后选择逃避痛苦的现实,把注意力放在虚拟世界,结果越逃避现实越糟糕,越糟糕越逃避,陷入恶性循环。多想变回高三时那个积极阳光、觉得一切都充满希望、一切皆有可能的少年,但时光是不可能倒退的,我只能背负犯过的错继续前行。”(B20)然而,这种向内的道德力量既可以在外部条件不利时激发独特的正向效能,随着时移势迁同样也可能出现反噬效应,即一旦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超出他们的心理和现实承受能力,这种道德化的约束力量就会面临崩溃。“当时(大二出现学业困难)除了困难我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没有什么积极的信息向他们汇报,我不会把消极的东西说出口,所以当时和父母沟通很少,也很害怕和他们沟通,因为我在他们那里的形象一直是很好的,所以很担心他们失望,我自己也很痛苦。”(A8)

相较于他人的责备、不理解带来的影响,底层子弟在遭遇挫折后生发的内在道德省思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过度道德化容易带来自身心态和精神动力的异化。这种彻底的、赤裸的自我道德审判会产生较强的后坐力,给人带来强烈的自责、愧疚等负面情绪,甚至把他们引向自我否定和自我放弃。“今天早上拍毕业照,我都会感觉很羞愧,不好意思去,昨天晚上和班长请了假,我不去了,感觉挺丢人的。”(A4)“自从我从大学退学以后,父母的小生意也失败了,现在爸爸在做保安,妈妈没有工作,觉得一切都被我毁了。”(A1)当然,在濒临退学面前,任何逃避都无处遁形,带有各种复杂情感的窗户纸也终将被捅破,从而转化为个人和家庭必须面对的挑战。

(三)教育支持的矛盾冲突

对没有家庭和社会根基的底层子弟来说,学校和老师是他们的重要依靠,而且学校公平的竞争机

制以及老师等贵人相扶也一直被认为是他们能够考入名校的关键。进入大学后,高中阶段的领先优势被“清零”,从曾经的高位势瞬间流动到平均位势甚至低于平均位势的落差,将他们裹挟进一种游离于学校视野之外的处境。

1. 从中心游离到边缘

从寒门走出的“贵子”都是所在县城或乡镇的风云人物,在学校里享受着如众星捧月般的优待,他们与老师之间往往建立了一种相互欣赏、相互成就、亦师亦友的深厚情感连结,一种共生共赢的交互系统,其中不仅包含老师对学生的肯定与期望、监督与约束等多重意涵,同时教师也被赋予改变学生命运的崇高使命。在小群体中居于优势位置带来的满足感、成就感、虚荣感等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赋予底层子弟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为他们取得高学业成就提供动力。进入大学后,同班不同课、同寝不同课成为常态,坐在一间教室上课的同学之间互不熟识也属正常,学业成绩仿佛是彼此间“不能说的秘密”。学生与任课老师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松散,这意味着底层子弟将失去过往习以为常并且非常渴望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特别关注,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紧密型师生关系遭到解构。此外,与老师互动更加密切的、率先进入老师视野的往往是那些积极主动、外向活跃的学生,这也为他们获取更多信息和发展机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学氛围和高中不一样,高中大家都很熟悉,一起学习,相处也挺好,我觉得过得比较快乐。”(A7)“到大学我发现花了力气但还是不能掌握这个内容,其他人却可以解决,当时觉得他们好厉害,我不行,这就是一个摆烂的开始。”(A8)

“精英大学场域中的主导文化是精英型文化,学生的出身以及出身背后习得的‘精英型文化资本’的质量对个体的影响在该阶段开始凸显。”^[16]大学犹如一个高速运转的轨道,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不不同程度地面临“脱轨”的危险,对大学的附着力越强(如更加适应学校文化、与老师和同学关系更加紧密等),就越容易胜任大学生活并从中脱颖而出。从站在大学生活的起跑线开始,大部分底层子弟就已经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到大学以后,课程学习迭代的速度突然加快,不像高中就只有那么几门课,我跟不上。一开始微积分没搞明白,后来再看见一长串字母和数字心里就害怕了。”(A2)与老师之间的疏离,阻断了底层子弟获得外部支持。当失去外界关注后,加之自我约束能力有限,他们可能开始沉迷游戏、自我放纵等,这进一步加剧学业和心态上的颓势。通常情形下,只有当底层子弟学业出现问题,辅导员、班主任等主动找上门时,他们才被动地与老师建立联系。有些学困生,直到濒临退学才不得不鼓起勇气主动寻求老师的帮助,而这时往往为时已晚。

2. 均质化的供给与差异化的分配

高水平大学提供给学生的除了优质的教学资源外,还有课堂之外丰富的文化滋养和资源供给,这同样是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养分。大学里诸如学生工作、社会实践、海外交流、创新创业等各类机会和资源虽然是均质化地面向所有学生开放,但无法不劳而获——一般采取大众公认的竞争机制进行分配,即想要获得相应的机会就需要通过竞争来实现。大学竞争法则通常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组织协调、沟通表达等综合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如在大学各种机会的获得通常需要经过面试进行选拔),而文化资本相对匮乏的底层子弟并不是此类竞争的“宠儿”,像面试、公开演讲、答辩等评价方式都会让他们感到捉襟见肘,他们经常会在各种选拔中四处碰壁,常常沦为竞争游戏中的“分母”,有时甚至连参与报名竞争的勇气都没有。“大学处处都光鲜亮丽,微信公众号里宣传的那些优秀的榜样,在我看来,遥不可及,他们经历的那些事我连参与竞争的勇气都没有,突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A11)这一竞争机制造成大学中并不均衡的资源分配结果,优质的资源总是会被优先分配给先天资源禀赋占优且目标明确、姿态积极的学生,这对底层子弟无疑会带来双重剥夺效应:第一重剥夺体现在与优势群体相比,底层子弟在教育资源获取方面存在劣势,即越是优秀的学生越容易受到教育资源的青睐,无形中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第二重剥夺体现在与优势群体资源获取的位势差中,底层

子弟主观认知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加剧其弱势心理,从而助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这种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虽然看似合理,但不可避免地给底层子弟参与竞争、获取资源制造了壁垒。“我不习惯求助于别人,觉得自己的问题应该自己解决,包括学习还有别的东西都是这样,所以我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太想要寻求帮助。”(A8)

遭遇这些困境的底层子弟,虽然也是精英大学的一分子,却并没有在内心深处真正形成作为精英的自我认知,时常会生发“校强我弱”的主观感受。“到大学以后学习习惯很差,刚开始还能保证完成作业,后面就不写了。高中的时候我也做不完作业,但是老师不会说我,因为我的成绩好,自己也会有一种优越感。”(A10)教育资源的差异化流动逐渐形塑学生群体的差序格局,学生群体的结构分化反之又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这样的非良性循环,对习惯依靠学校教育支持的底层子弟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3. 专业流动的悖论

选大学、选专业是一种以填报志愿为载体的博弈过程。然而,大学生在选专业时感到迷茫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他们对自身兴趣专长以及大学专业都缺乏了解,盲目地持有一种功利心态,即希望通过选名牌大学、追热门专业实现将高考分数利益最大化,这些看似聪明实则草率的选择暴露了他们对大学规划的不清晰。“我的专业是根据分数选的,自己也不是很懂。专业是否与自己的兴趣相符,我也没有考虑过——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只是盲目地随大流。”(A3)大学阶段,学科和专业会发生显著分化,不同专业在培养方案、课程安排、学业难度、考核形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学生个体在兴趣、性格、能力、职业观等方面的异质性,影响其与所学专业的匹配度。对所学专业的喜爱程度和适应程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就读体验。对专业的排斥,甚至会使学生萌生摆烂或者退学的消极想法,并诱发心理危机。“刚考上大学时,自己已经被喜悦冲昏了头脑,什么也不懂就选了现在的专业。当觉得自己选错专业以后,内心已经把这个专业渲染到自己完全接受不了的程度。”(A1)

当前,大学生专业流动属于常规操作。但在转专业时,专业接收侧重争取优质生源以及出于规避风险等方面的考虑,总是更倾向把转专业机会留给学业成绩优异的申请者,形成优势专业与优势学生的“合谋”。就那些不适应原专业的相对劣势群体而言,转入其他专业尤其是申请人数较多的专业,无疑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在无形中出现了一个悖论,即专业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转出本专业,专业成绩差的学生反而难以流动。“当时申请转专业,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挂科太多、绩点太低了。”(A3)对学困生来说,同一学校内不同专业的流动已经如此不易,跨学校的流动更是难上加难。虽然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提出:“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17]但从执行层面看,这仍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底层子弟面临的退学危机,是内在动力桎梏、代际互动冲突以及教育支持错位等结构性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个人层面看,挣脱片面优绩主义的桎梏、进入崭新又陌生的大学生活后,底层子弟的学业本位主义信念与原本的学业优势同时受到冲击,容易在意义世界中迷失沉沦;从家庭层面看,家庭弱支持与高期待编织的道德枷锁,造成家长在底层子弟的人生逆境中遗憾“缺场”,并形成道德与情感上的双重剥夺;从学校层面看,教育过程中底层子弟边缘化的现实境遇,带来教育资源的差序流动与学生群体的结构分化,阻滞了底层子弟获取教育支持。同时,三方面力量并非孤立运行,也会发生交互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底层子弟的学业表现(如图1)。如学生个人的心态和认知会影

响亲子关系以及学校中的教育参与及资源获取机会,家校协同会影响学生的外部支持,当“生—家—校”共同体的生态平衡从三方面被同时打破,底层子弟就容易陷入濒临退学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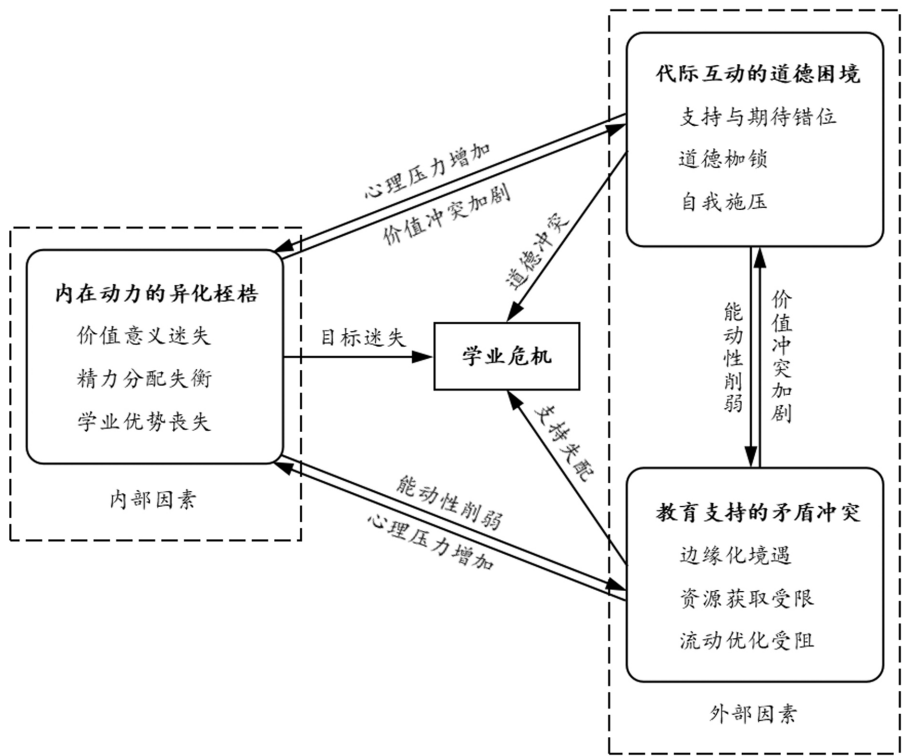


图1 高水平大学底层子弟学业困境的形成机制

底层文化资本自提出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赞同的观点认为其弥补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缝隙,同时也不乏批判的声音,认为其有歌颂苦难、为现有价值分配规则作辩护的嫌疑。就现实而言,这群来自底层却在高考中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名校生成功逃离了布迪厄关于社会阶层复制的预言,成为底层文化资本的鲜活例证。从其中部分群体濒临退学的边缘化经历看,底层文化资本理论主张的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3种要素又在大学阶段遭受新的挑战,仅以底层文化资本失灵来理解高水平大学底层子弟的学业困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底层子弟在大学遭遇的学业困难乃至濒临退学的窘境,既是底层子弟的现实境遇超出底层文化资本的限度呈现的结果,也反映了底层文化资本在嵌入精英大学文化场域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同时也说明底层子弟在获取其他优势资本时受到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底层文化资本的“失败”。事实上,底层文化资本与其他优势资本并非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正是在优势文化资本与底层文化资本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有效弥补位阶差距给底层子弟带来的落差和冲击,构成其向上流动的文化资本“密钥”,这何尝不是中国语境下底层子弟独特的社会流动叙事。

(二)对策建议

虽然濒临退学属于小概率事件,但本文聚焦的底层子弟遭遇的结构化困境在更大范围的学生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个人、家庭、学校犹如学生发展成长的三道防线,学校是居中协调、联动各方的积极力量,在化解学生的学业困境方面大有可为。

1. 完善学生学业支持体系

学业竞争是高水平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即便都是高手过招,也注定会产生一部分处于相对劣势的失意者,需要予以及时关注和支持。(1)构建学业风险预警机制。主动把握入学季、考试周等关键节

点,重点关注底层子弟等学业困难易发群体,联动任课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等育人力量及时分析研判学生日常学业生活表现,特别是如翘课、挂科等学业边缘化行为,尽早捕捉学生出现学业困难的各种苗头和倾向,为后续必要的学业支持争取主动。(2)分层分类提供学业帮扶引导。既要考虑学生出现学业困难的程度,又要兼顾学生学业问题的诱因,综合学生主观和客观因素精准施策。灵活运用谈心谈话、朋辈辅学等多种手段,持续探索拓宽转专业渠道并结合学生具体特点提供科学的指导建议,提高学业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3)适时适度进行家校联动。尊重学生主体性,充分考量学生与家庭互动现实情况,以循序渐进的沟通方式促进亲子双方的理解,增强家校联动共识,弥合代际互动中的道德冲突和情感裂缝,引导家庭发挥生活支持及情感支持的独特功能,对孩子在大学中遭遇的学业困境给予理解和鼓励,并配合学校共同做好帮扶引导工作。

2. 实施文化资本补偿策略

鉴于学生在大学中分层分化的结构特征,教育支持需以差异化思维响应学生成长发展的异质性需求。学校要充分认识到底层子弟在精英文化主导的大学生活中存在的潜在边缘化风险,有意识地补充底层子弟相对匮乏的优势文化资本,提升其驾驭大学生生活的本领。(1)化解大学适应融入的潜在障碍。紧抓从高中到大学这一学段转换的关键阶段,在新生军训、始业教育等环节要着重讲清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及文化环境之变,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类学业、交往、心态等方面的考验。特别是对于在融入初期出现明显不适的个别学生,需要采取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支持举措,确保学生顺利开启大学生活。(2)增强底层子弟的校园体验。各类学生组织、社团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阵地,要有意识地吸纳具有先赋性文化劣势的底层子弟,主动提升成员的多样性,打破圈层化壁垒,形成融合互补、交流互鉴的生动局面。同时,还要注重提升各类校园文化活动的辐射面,避免制造少数人的“狂欢”,致力于增强更大范围学生群体的参与感和获得感。(3)拓宽发展型资助模式。在为底层子弟提供必要经济支持的基础上,坚持“扶困”与“扶志”“扶能”相结合,将部分以直接的经济支持为主要方式的保障型资助资源,转化为以能力塑造为主要目的的发展型资助资源,探索通过项目制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支持底层子弟获取社会实践、企业实习、海外交流等机会,助推其全面发展。

3. 营造集体关怀文化氛围

大学文化是学生沉浸其中并且日用而不觉的宝贵滋养,然而“卷绩点”“学霸”“造神”等优绩主义叙事在名校中盛行,对身处其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形成现实和情感的双重剥夺,需要及时纠偏。一方面,改善学生个体体验。发挥学校育人主体的能动性和导向功能,让学生在课程教学、创新实践等师生互动的具体情境中感受“被看见”“被关注”,引导学生超越零和博弈狭隘的竞争思维,转而在更广阔的意义空间主动寻觅人生价值、确立人生目标,并且根据自身现实情况合理设置个人发展预期、动态调适个人心态,避免因学业过度道德化而自我施压。另一方面,优化典型宣传塑造。“胜利者叙事带来的很有可能就是失败者被‘贬黜’。”^[18]学校要摆脱优胜劣汰的优绩思维,采取分镜头式的叙事手段,既要展现优势群体的卓越成绩,又要看到相对弱势群体在文化穿梭中超越自我的生动叙事,让学生认识到优秀的人并非千篇一律、成功的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强化学生的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

参考文献:

- [1] 张聪聪,朱新卓.处境不利学生如何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双一流”建设高校农村学生学业抗逆历程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12):2533.
- [2] 李佳丽,郑磊,聂倩.冲破樊篱:弥补性资源、底层文化资本与寒门子弟教育获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3(3):106107,118.
- [3] 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4):8391.
- [4] 朱榕君.城乡之间:底层文化资本生成的空间机制[J].中国青年研究,2021(4):98105.

[5] 王丹,陈佳欣,史和佳,等. 阶层流动还是阶层复制? 再读文化资本理论并兼谈“底层文化资本”[J]. 复旦教育论坛,2023,21(6):5462.

[6] 高水红,马姝凡.“底层文化资本”何以可能[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2(6):1014.

[7] 谢爱磊,白宜凡.“自我低估”: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社会能力的自我建构[J]. 教育研究,2023,44(5):103118.

[8] 廖青,黄绮妮. 阶层身份认同:理解我国农村籍大学生就读经验的新视角[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41(6):75-82.

[9] 李琳璐. 精英大学“小镇做题家”的生存状态与行动逻辑[J]. 重庆高教研究,2024,12(4):113127.

[10] 李济沅. 名校生退学现象的分析与反思[J]. 中国青年研究,2025(1):6270.

[11] 代玉启,李济沅.“小镇做题家”现象的透视与解析[J]. 中国青年研究,2021(7):8995.

[12] 小镇外的“做题家”:一个八万人豆瓣小组里的心灵回声[EB/OL]. (20200728) [20250411]. https://www.sohu.com/a/410065718_260616.

[13] 郑雅君.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27.

[14] 程猛,史薇,沈子仪. 文化穿梭与感情定向:对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情感体验的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9(7):3037.

[15] 程猛,康永久. 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J]. 中国青年研究,2018(5):6875.

[16] 王兆鑫,陈彬莉,王曦影.“学业文化资本”的彰显与式微:精英大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求学历程[J]. 重庆高教研究,2023,11(6):3142.

[17]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EB/OL]. (20170216) [2025041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702/t20170216_296385.html.

[18] 刘铤,陈鹏.“底层文化资本”的象征资本问题:阶层突破的评价社会学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2023(5):5967.

(责任编辑:张海生 杨慷慨 校对:杨慷慨)

From Being Named on the Golden List to the Brink of Dropout:
Structural Dilemma of Cultural Capital of Underclass

LI Jiyuan

(Moral Education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experiencing academic attrition—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withdrawn or received academic warnings—at high-level universities, coupled with digital ethnography of dropout-related discourses on Zhihu platform,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underlying cultural capital, which once empowered disadvantaged youths to achieve academic success and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now demonstrates explanatory deficits among certain undergraduates within these elite institutional contexts. The dropout crisis confronting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s not the result of a singular force, but rather stems from the confluence of structural factors—including constrained intrinsic motiva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conflicts, and misaligned educational support systems. While this reflects a degree of structural incompatibility as underlying cultural capital embeds within elite university settings, it does not signify the “failure” of such capital. Rather, this phenomenon manifests when the lived realities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exceed the threshold capacity of their inherite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strategically leveraging their own underlying cultural capital while proactively acquiring complementary cultural capital possessed by dominant groups can empower them to navigate novel challenges.

Key words: underlying cultural capital; students at high-level universities; on the brink of dropping out; formation mechanism

《重庆高教研究》2025 年总目次

■ 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思想:超越研究方法的“方法”

——关于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的思考 邬大光(6-3)

面向 2035 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总体框架、议题回顾与实践展望 解德渤(6-11)

多学科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学:一个面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史梳理 赵祥辉,吴英琪(6-27)

■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专题

建设教育强国,未来学校何为 顾明远,孔 苏,郭 昶,王 凯(1-3)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八点建议 杨德广(4-3)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学术论争与逻辑理路 田贤鹏,韩玉静,刘 丹(4-13)

成就动机与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差异:拔尖学生的多类型剖析 陈昱泽(4-23)

全球教育强国的理想政府模式及治理逻辑 张 晴(5-49)

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力资本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及 2035 图景 邵剑耀(5-61)

■ 学科史与学科基本理论(栏目主持人:阎光才)

微观决策: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革新 陈 涛,徐晓娟(1-107)

从传统到现代:高等教育理念的缺失与修正 张雅鑫,王建华(1-118)

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相关议题探讨 阎光才(3-3)

中国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建设:新生代学者的缺位与诉求 刘 进,王思宇,于宜田,高 媛(5-96)

论数字化时代的“伪欲望”与节制的教育 邹红军(5-108)

■ 高教治理(栏目主持人:李立国)

大学运动式治理的价值意蕴、实践限度与转型路径	肖京林(2-60)
我国科研评价政策注意力配置的范式转换与决策偏向	李彦,代阳(2-69)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视角下西部高等教育布局优化分析	李立国,田浩然(3-13)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杜艳芳,刘义兵(3-25)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政策对科研产出质量的影响研究	杭建琴(4-35)
“双一流”建设高校产教融合的困境与突破	耿乐乐,张萌(4-47)
数字时代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挑战与应对	刘爱生,魏立才(4-59)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法治支撑(笔谈)	
.....	李立国,湛中乐,龚向和,姚荣,何俊毅,李玉璧,郑磊(5-3)
学位争议中学术自治事项的实质审查	刘旭东,顾赵丽(5-25)
学位争议多元解决机制的实践检视、价值基准与规范完善	车骋(5-36)
中国大学学术人才流动规律:籍贯效应与区域差异	林松月,于宜田,刘进(6-54)
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选择到什么地方高校获取教职	
——基于2474名高校青年教师简历的分析	李永刚,化超凡(6-69)

■ 教育数智化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科学研究范式创新:价值、风险与进路	赵晓伟,王小雨,王艺蓉,沈书生(1-9)
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障碍因素	丁宝根,方羽(1-21)
人工智能推进教育教学重构的思考	瞿振元(2-3)
数智化大学:内涵意蕴、主要特征与实现路径	百里清风,李昕琦(2-41)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学术社会化:特征、困境与纾解	刘之远,王鹏(2-50)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教育变革:机制、风险及应对	
——以DeepSeek为例	郭蕾蕾(3-38)

数智时代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及其应对 刘东华 (3-48)

地方政府数字教育政策注意力配置差异与治理路径 李海龙,陈翠荣,崔红岩,张雅静 (5-75)

大学生何以沉默:数智时代课堂生态联结的断裂与重构 邵 郁,张伟娟 (5-86)

■ 青年人才发展

大学层级化何以形塑自我位置感

——基于某地方高校本科生的纵向民族志研究 汪卫平,袁 晶,王治森 (1-70)

独立学院转设对生源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大学声誉与多期 DID 的实证分析 王新萍,夏 焰 (1-82)

研究生分类培养改革(笔谈) 陈洪捷,魏丽娜,陈 涛,罗英姿,王东芳 (2-7)

高校何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基于对百位院士访谈文本的内容分析 李 刚,郑泽琳,张佳巍 (2-18)

高校准聘制青年教师绩效压力与职业成长的倒 U 型关系及影响机制 迟景明,张 鑫 (2-27)

博士生学术发表的规训效应与早期学术职业发展 张海生 (3-63)

通往学术之路的“打杂”:硕士生参与学术辅助事务的体验研究..... 卢 意,雷 爱,巫 晖,张瀚文 (3-79)

有谁能懂我的痛苦:社交媒体中博士生负性情绪的叙事研究 李彩玉,曲铁华 (4-70)

学术职业社会化的二次飞跃:博士后阶段的惯习重塑与角色突破 王馨然 (4-81)

■ 时论与争鸣

“制造进步”还是“实干兴校”:高校参与中小学改进的批判话语分析 李 星,李太平 (1-94)

高校教师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效应和潜在风险 郭 磊,贾润雨,曹琛璐 (2-117)

课堂隐退:大学逃课现象的生成机制与理性审思 马成俊,刘平剑 (3-117)

过度竞争何以发生:大学生学业内卷的生成机制与纾解策略 汪雅霜,梁 艳,袁玉婷 (4-93)

破解大学教师角色异化:“自身关怀者”的主体性澄明与交往实践 王立平,侯长林 (4-105)

走向人机协同:大语言模型赋能学术论文评审的效能与边界	焦丽珍,刘 选,刘俊杰,钟洪蕊(5-119)
从金榜题名到濒临退学:底层文化资本的结构性困境	李济沅(6-117)

■ 教育与经济

从人力资本到国家知识资本:学历教育、认知能力对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	方 超,丁 洁(1-32)
促进或制约:“双一流”建设高校资源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冯晓潇(1-45)
共同富裕目标下高等教育获得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	万 洋,李锋亮(1-58)
我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研究	王森森,杨 军(2-80)
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仝宣文,陈庆庆,李 霞(2-94)
高校同城新建校区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研究	张文杰,林 璐,哈 巍(2-106)

■ 西部高教论坛

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一个内生力模型	蔡宗模,吴朝平,张海生,杨慷慨(6-83)
他们为何想成为乡村教师	
——乡村定向师范生的阶层身份认同路径	谢霁月,首 新,蔡其勇(6-100)

■ 高等职业教育

数字化赋能职普融通的基本逻辑与风险规避	赵磊磊,吴小凡,周慧蓉(3-90)
职普融通的时空逻辑:价值意蕴、历史流变与发展路径	罗琰文,朱德全(3-100)

■ 教育智库(栏目主持人:姜朝晖)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郭利霞(3-110)
世界一流高校教育智库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及其启示	
——以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为例	姜朝晖,兰思亮,李 洋(4-114)
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问题的热点与突破点	黄贵懿,牟 芷(4-120)
地方高校产教融合的现实问题与路径突破	祝朝伟(6-110)